

“五四”时代战斗的号角

——略論“呐喊”

陆 耀 东

发生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方面是政治运动；另一方面，又是声势浩大，威力猛烈的文化革命运动。

鲁迅和他同时代同方向的作家一起，在这次文化革命战斗中，立下了伟大的不朽的功勋。毛主席指出：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的方向。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9页）

毛主席这一段话，十分公允、十分精确地对鲁迅的一生作了总结和评价，这自然也包括了鲁迅在从事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五四”时期的功绩在内。

在这篇短文里，我没有力量也没有可能全面地论述鲁迅先生在“五四”时期文化革命中的全部建树，只是粗略地谈谈他在“五四”时期写的短篇小说集“呐喊”。

无论“五四”当年，或者是在我国整个现代文学史上，迄至现在，最真实、最深刻地描绘了“五四”时代我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面貌，最集中、最充分地反映了“五四”时代的社会问题，最强烈地表现了“五四”时代革命精神的文学作品，是鲁迅的“呐喊”。

这样来谈鲁迅的“呐喊”，并没有半点夸张。历史事实俱在。茅盾同志在为“新文学大系”写的“现代小说导论”（一）中，曾清晰地介绍了当时的文坛情况。

民国六年（一九一八）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出现的时候，也还没有第二个惹人注意的作家，更找不到同样成功的第二篇创作小说。

仅仅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了解鲁迅的“呐喊”在当时的文学运动中，起了多么巨大的开闢和首创作用。

鲁迅先生自己在“现代小说导论”（二）中更进一步说明：

凡是关心现代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当一九一五年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却全部是文言的。……

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

的認為“表現的深刻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

“吶喊”，從形式的內容，在當時都起了首創的革命作用，都是服務於當時的政治鬥爭的。

“吶喊”為我國新文學揭開了嶄新的一頁，在文學史上，起了劃時代的作用。它宣告了文言文的死亡，它把我國現代文學創作提高到現代世界文學的水平，至於它所表現的“五四”革命精神，則更是值得我們珍視。

“吶喊”的第一篇是“狂人日記”。這篇小說寫於一九一八年四月，是在“五四”運動前一年寫的。然而，它正和高爾基的“海燕之歌”一樣，成了革命前的激動人心的戰鬥的號角。在“狂人日記”中，十分強烈，十分堅決，十分徹底的反封建精神，躍於紙上，充分表現了“五四”時期的革命精神。

“狂人日記”中的狂人，是一個被封建統治階級迫害得發狂的精神病患者，他雖然具有精神病患者的特徵，但他的一切心理變化、言論、對事物的反映，仍清楚地曲折地反映了封建社會和它的統治階級的罪惡。他一針見血地揭露了封建社會的本質。

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

“吃人”，這兩個字，是多麼真實而深刻地概括了封建社會幾千年來的歷史和它的真正內幕。

狂人看見趙貴翁的怪眼色，便感到危險，因為“似乎想害我”；趙家的狗，看他兩眼，狂人立刻警惕起來，覺得“須十分小心”；醫生給他診病探脈，他就認為：“這老头子是劊子手扮的！無非借了看詠這名目，端一端肥瘠；因為這功勞，也分一斤肉吃”。……

這一切，一方面，我們不應當生硬太死板地去理解，因為他的感覺，或多或少是帶有狂人的心理特徵的。如吃魚時他那樣心情就只有精神病患者才有。

陳老五送進飯來，一碗菜，一碗蒸魚；這魚的眼睛，白而且硬，張着咀，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一樣。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魚是人，便把他兜肚連腸的吐出。

（“魯迅全集”第一卷12頁）

我們不能說，這魚又是象徵着什麼。否則就近於牽強附會了。但是，就是這個情節，也不是沒有意義的。它說明了封建社會“吃人”現象的普遍而且嚴重，以至他被嚇成了神經病，以至他時時怕任何與“吃人”現象有相似之处的東西。

在封建社會里，統治階級对被統治階級確實是“吃人”與“被人吃”的關係。農民，多少人在封建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下無聲無息地死去。難怪狂人那麼敏感。當地主、惡霸這些吃人魔王和他們的狗腿子用兇惡的眼光掃射農民一眼的時候，誰不心驚胆跳，怕發生什麼橫禍，怕又要遭算計了。因為在封建社會里，農民沒法掌握自己命運。窮人病了，或是遭到了什麼不幸，地主來看農民時，這絕不會是善意的關心，而是想趁火打劫，要農民傾家蕩產。……

正是因為封建社會里充滿着這樣“吃人”的事實，所以狂人才會有那種反映。當我們把這些社會現象與狂人的那些感受對照一下，我們就可清楚地理解狂人產生那些變態心理的社會根源，便可看出狂人的種種敏感，都是現實生活曲折的反映。

狂人直接地指出，他大哥也是吃人的，根據之一是：“前天佃戶要減租，你說過不能”。

佃户辛辛苦苦一年，迁到了歉收年景，请求减租，地主并不答应。这，只有用“吃人”两个字最能恰当地说明问题。

从这样的思想高度来认识封建社会，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在当时的作家中，确实还没有第二个人。

鲁迅先生，通过“狂人日记”，向封建社会投了致命的一枪。

反封建精神，在“呐喊”中，是一根红线，贯穿着全书。“孔乙己”，“药”，“明天”，“故乡”，“阿Q正传”，都从各个方面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吃人的本质，体现了“五四”时代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精神。

孔乙己，这个身穿长衫、满口之乎也者的人物形象，令人恨，又令人可怜。他是被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教育摧残了的畸形儿。“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后来，以至作小偷，被丁举人打得半死；最后，便不知怎样痛苦地死去了。

孔乙己的遭迁，主要是封建社会给他安排的，所以他的悲剧，不是他个人偶然地碰上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封建教育能给教育者什么呢？除了“之乎也者”以外，不曾给予任何东西，从小，封建教育就剥夺了孔乙己的一切谋生手段，封建社会给他这样没进学的穷知识分子的路，就是死路一条。

小说一再写到孔乙己偷了人家的书，被吊着打；后来，丁举人把他的腿也打折了，以至只能坐着用手走路。这决不是闲笔，应该说这是作家认识到了孔乙己这样一些人的命运，是完全操纵在丁举人这样一号人物手里；有意识地暴露封建社会的罪恶。“狂人日记”中说，封建社会的历史，只有两个字：“吃人”，这在“孔乙己”中，我们又找到了活的註脚。

在“药”、“明天”中，鲁迅先生主要从社会风习方面来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谴责当时的社会。

小栓和宝儿完全可以说是封建迷信的牺牲品。小栓害了肺病，这在闭关自守、迷信统治着社会的当时，毫无办法可想，只有听从封建社会的迷信，以为用人血蘸馒头作药，可以治好。结果，蘸的血，是革命者的血，而小栓呢，也死于迷信的戕害之下。单四嫂子的儿子小宝病了，也只有存封建世俗的束缚下想办法：求神籤，许愿心，吃单方，最后，只有去请那不懂医药的庸医何小仙诊。孩子快死了，这庸医还说，先去吃两帖。在那样的时代，我们一点也不能责怪单四嫂子，因为当时社会限制了她。单四嫂子希望“宝儿也许是日轻夜重，到了明天，太阳一出，热也会退，气喘也会平的：这实在是病人常有的事。”而结果，“明天”，却没有给她带来福音，而是儿女的死亡，而是她的更孤苦的生活。

熟悉“五四”当年情况的同志知道：“五四”提出了科学和民主，尊崇“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从“呐喊”里，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理解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口号了。

“药”、“明天”，不止谴责了封建迷信，但对封建迷信的揭露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故乡”从地主阶级给农村带来的悲凉，从农民在地主阶级的压迫下气息奄奄，向封建的农村统治着提出抗议。二十年前，闰土是一个活泼、聪明的孩子，经过二十年，“多子，飢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也象一个木偶人了。”读了“故乡”，谁都会感到：封建社会是一个监牢，在摧残着农民。

“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赵秀才，那些封建魔王对阿Q的欺压，更令人气愤，更触目

惊心。阿Q给他们作牛马，然而阿Q连姓赵的权利也没有。

……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不仅如此，阿Q的灵魂，阿Q的生命，也全部断送在这些魔鬼手里。阿Q精神，就是统治阶级的给予；阿Q被以莫须有的罪名，糊里糊涂地被枪斃，更直接是封建统治者一手制成。

如果我们仅仅说“呐喊”体现了反封建精神，那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也不能说明它是“五四”时代的战斗号角。记得車尔尼雪夫斯基在“果戈里的作品写信”一文中说过：

謝德林和梭罗古勃伯爵同样地都不高兴我们有贪污现象。他们俩都攻击这种恶习，然而大家却讚揚謝德林而譏笑梭罗古勃：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对贪污的仇视，在这两位作家是由于完全不同的信念引起的；因为这两位所攻击的恶习，他们是完全不同地加以理解的。知道作家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还不够，——知道这件事情根据什么信念说他喜欢或不喜欢，也是重要的；需要知道，他把他们所攻击的缺点归结于什么原因，他认为用什么方法可以消灭弊端行为，企图用什么来代替他想根除的东西。

（文学的战斗传统118.119頁）

对于“呐喊”的反封建精神，我们同样需要这样去了解。不然，几百年前写的“红楼梦”有反封建精神，晚清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有一定的反封建精神，象“老残游记”也有对封建统治某些现象不满的情绪；与鲁迅同时代的，也还有胡适的所谓反封建。

事实很清楚：有站在封建统治者立场对当时社会个别极黑暗的现象不满的作品，如“老残游记”，作者对酷吏不满，可是他是认为酷吏不利于封建社会的巩固，所以反对它。有站在资产阶级右翼的立场去进行所谓反封建。

“呐喊”中的反封建，与以上所举的迥然不同。这，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

第一，“呐喊”对封建社会的攻击，是针对整个封建社会，作者对封建社会和统治阶级深恶痛绝，没有丝毫的温情。“狂人日记”最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它所攻击的，绝不是封建社会的枝节，一点一滴，而是整个社会，整个封建社会的“吃人”的本质。它横扫封建社会的一切。所以作者提出的要求，不是改良主义，而是彻底推翻封建统治。狂人说：“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这就预告了封建社会乃至任何剥削阶级统治的必然毁灭。我们联想到鲁迅先生后来（一九二五年）在“灯下漫笔”中所说：“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我们就更容易了解“将来是容易不得吃人的人”的内涵。鲁迅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莫不深恶痛绝。无论是丁举人，或者是赵太爷、赵秀才，鲁迅在笔下从不留情，绝不象有些作家一样，有时又有点含情脉脉。

第二，“呐喊”的反封建及其描写任何生活现象，是从人民大众立场出发的。如果我们读了“一件小事”和“故乡”，就完全可以觉察到，就在“五四”时期，鲁迅对人民也是十分热爱的。“一件小事”描写的人加車夫的高大形象，多么令人崇敬。車主的車把帶倒了一个横截到車前来的妇人，她本来伤势不重，而且很难说是人力車夫的过错，可是車夫自己到巡警分驻所去承受处分。作者这时禁不住用诗一样的语言去贊誣这个人力車夫：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

这种出自内心的对于劳动人民的敬爱，如果不是作者热爱劳动人民，是不可能有的。

鲁迅对闰土（“故乡”）的感情，真象亲如兄弟，情同骨肉。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是只想到闰土和他儿子的生活，而且想到了世世代代农民的痛苦，所以他希望下一代“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历过的”。鲁迅的笔，一触及人民，就流露了一种同呼吸，同命运的亲切感情。有些人说，鲁迅当时是过多地看到了人民麻木的一面，我以为，“呐喊”中虽然也有一点点这样的东西，但是，鲁迅绝不象某些人一样，由此就认为人民大众是“羣盲”，而流露出“超人”的高傲。他即使对象阿Q这样有严重缺点的劳动人民，也仍然一方面是恨他的落后思想，不觉悟，“怒其不争”，另一方面，也深深同情他，“哀其不幸”，当阿Q被阶级敌人欺压的时候，鲁迅先生把愤怒的火焰朝向了阿Q的敌人。

正是由于鲁迅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去观察、分析、判断事物，所以就决定了他的作品中的反封建精神，是彻底的，不妥协的。

如果说，在“五四”当时，反封建把人们分成两个营垒，那么，对人民的态度，就是一个人是否为人民大众而战斗的试金石。凡是坚定地站在人民大众立场反封建的，才是最坚决的，否则，即使能偶然猛杀一、两枪，结果仍然会退下阵来。

第三，鲁迅对反封建不彻底的辛亥革命是很不满的。这在“呐喊”中，是不止一次地描写并讽刺了的。“阿Q正传”写到：辛亥革命在农村中被地主掌握了领导权，他们篡夺了革命，赵太爷和赵秀才居然挂上了革命党的招牌，“革命”时，他们革掉了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牌子，还把静修庵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革”到他们家里去了。“风波”反映了辛亥革命在农村中只是使七斤剪了发，但他反而被吓得要命，害得他全家虚惊一场。辛亥革命虽然把满清皇帝赶跑了，但整个封建社会的制度，阶级关系，却没有任何改变，它给农民没带来任何好处，半点解放。在“头发的故事”中，N说了一句笑话，说辛亥革命后，最得意的是象他那样剪了辫子的人，在路上走，再不被笑骂了。这话自然是讽刺。却也是句实在话。

鲁迅最不满意辛亥革命的地方也就在这里：革命不彻底，没给人民带来什么好处，这里也曲折地显现了鲁迅先生的主张：要彻底地反封建，要不允许吃人的人存在，要有“新的生活”。

从以上我们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在“呐喊”中，鲁迅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提出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的。

而这正是“五四”时代的精神，正是“五四”时代的反封建不同于以前任何时期提出的反封建。

“五四”运动之所以具有这种本质特点，是由于它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是由于它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成长，马克思主义已开始传播的情形下发生的，是由于它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的社会性质虽然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因而它不属于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而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

鲁迅在“五四”时期，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还没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在“故乡”中说，水生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而作家自己并不明确这“新的生活”的具体内容；在“狂人日记”中，作家说“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而具体的革命道

路作家自己也是茫然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一点，鲁迅在“五四”时期，是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某些影响的。更重要的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过：

……这些战士（五四时代的战士——引者），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錯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

鲁迅的“呐喊”是听“将令”的，这“将令”，就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大钊等“新青年”编者的“将令”，也就是“五四”时代精神的将令。“呐喊”的步调和“新青年”一致的，所以我们说，“呐喊”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萌芽因素。

“呐喊”，是“五四”时代革命精神的“呐喊”，它是时代的最强音，它象一支伟大的战斗号角，号召人们向封建社会作毁灭性的攻击！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四日